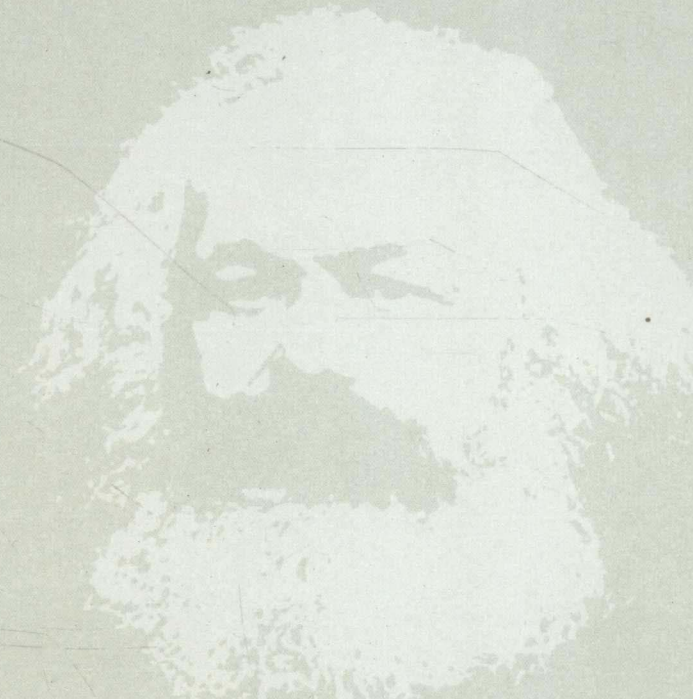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 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宋镜明 吴向伟 等著

DANG DE ZHONGYAO LISHI RENWU YU ZAOQI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 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宋镜明 吴向伟 等著

DANG DE ZHONGYAO LISHI RENWU YU ZAOQI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宋镜明, 吴向伟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61 - 1265 - 6

I. ①党… II. ①宋…②吴…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②马克思主义 - 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K827 = 6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752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秦 艳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丛书系武汉大学“985工程”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和“211工程”项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成果

总 序

顾海良

新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要求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武汉大学一直居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列。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作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員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编纂出版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就是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实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尊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遵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特殊要求，要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希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的出版，能为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增添新的光彩。

第一，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影响力。把提高学术影响力放在首位，是从学科建设视阈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要求。学科建设以学术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级学科，在提升学科的学术性时，要按照学科建设内在的普遍的要求，使之具有明确的学科内涵、确定的学科规范和完善的学科体系。

学术影响力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不仅在于国内的学术影响力，还应该树立世界眼光，产生国际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学术研究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导向的。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不仅有利于达到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且还有利于国际范围内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交流,产生国际的学术影响力。比如,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传播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研究,科学考据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编辑与研究等,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不但要高度关注和重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要参与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上,我们要有更广泛的话语权,要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别人在研究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有哪些重要的理论成就、产生了哪些理论的和实践的成效等。如果一方面强调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另一方面却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论坛上被边缘化,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学科建设的结局。

第二,要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任何学科都有其特定的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就是这一学科应用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使命。在实现这一影响力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是重点;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于实践、以此推进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要体现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不断探索上,并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定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学科建设的应用价值。

第三,要提高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和安全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学科建设中，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成效，进一步维护和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新世纪党的建设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四，要提高全社会的思想理论素质，加强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全社会的思想理论素质是一定社会的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定社会的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最为重要和最为紧迫的任务和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首先就应该体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全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用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的头脑，内化为全体人民的思想观念与理论共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

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学术的影响力、现实应用的影响力、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在对四个方面影响力的理解中，既不能强调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学术性而否认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也不能只顾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而忽略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学术性。要从学科建设的战略高度，全面地探索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力。

我衷心地希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能在提高以上四个方面影响力上作出新的贡献！

目 录

导言	(1)
一 满腔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1)
二 在论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	(4)
三 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	(6)
李大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1)
一 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12)
二 关于建党思想与建党活动	(25)
三 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形式和领导权	(27)
四 对农民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	(32)
五 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与展望	(37)
陈独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2)
一 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43)
二 积极研究、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50)
三 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64)
李达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82)
一 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83)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突出的“播火者”	(87)
三 致力于党的创建，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基础	(99)
四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可贵步伐	(104)
李汉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17)
一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118)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特点	(122)
三 关于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问题	(140)
四 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149)

瞿秋白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62)
一 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164)
二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领导权问题	(168)
三 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阐述	(175)
四 关于党的建设理论	(182)
蔡和森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88)
一 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及时代烙印	(188)
二 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阐发	(198)
三 对私有制经济形态的批判及对现时中国经济的分析	(204)
四 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与党的历史问题	(212)
五 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	(221)
周恩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30)
一 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232)
二 投入党的创建活动, 阐发党的建设学说	(240)
三 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的分析	(245)
四 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建设的学说	(248)
五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学说	(253)
邓中夏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60)
一 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论述	(263)
二 关于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268)
三 关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问题	(275)
四 系统地阐述关于工会问题的理论	(280)
恽代英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85)
一 坚持不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286)
二 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阐述	(295)
三 关于农民问题和统一战线的理论	(300)
四 关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	(310)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后记	(319)

导 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层涵义，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①。在中共早期（1919—1927），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不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争，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满腔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建立团体，创办刊物，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年，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热烈地赞扬俄国十月革命，认为它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既标志着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① 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在李大钊培育和影响下，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人，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各地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

关于唯物史观，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① 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如果它束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②。因此，阐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生产”与社会制度的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之要旨”，“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③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他们指出，劳动力使用价值永远大于它的价值，那多余的部分，叫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正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在。阐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分割问题，指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④“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⑤

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他们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分析，是以是否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手段）来划分的，占有土地、资本者可以剥削压迫不占有者，他们的利害是相反的。这两种阶级，历史上斗争不断，“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⑥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其要义有二：“（一）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3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4页。

④ 同上书，第192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⑥ 同上书，第243页。

……（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①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②。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成熟起来的。但不能以此认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是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应该说，他们已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考虑中国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李大钊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③ 陈独秀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他认为，“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④ 李达指出，无产阶级究竟怎样进行政治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筹划，那是要“按照中国国情”^⑤ 来决定的。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中国无产阶级“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⑥ 李汉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时设施，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莽撞了”。^⑦ 那时有这些看法是难能可贵的。正是从这些认识出发，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⑧。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5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③ 同上书，第306页。

④ 转引自《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9—370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⑥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⑦ 李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5月30日。

⑧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二 在论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战胜其他社会思潮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在同各种思潮并存、相比较中传播开来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时期同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展开了论争，在大革命时期又批判了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外来好听的“主义”的谬论，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必须用主义作指导。陈独秀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所以，“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①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胡适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认为，所谓根本解决，就是要用革命手段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改造。陈独秀指出，要解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一点一滴的改良办法是不行的，“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制度不可”^②。

为什么要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在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作出了回答。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还没有无产阶级，只有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撰文揭露了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论调，并强调，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在对戴季陶主义的阶级“仁爱”论的批判中，他们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恽代英说：“有人说阶级争斗是人们提倡起来的，以为是马克思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发明出来的，实则阶级斗争是几千年来事实，马克思不过将它说明罢了。”^① 陈独秀指出，作为唯物史观论者，“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斗争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斗争中需要发展阶级斗争这个矛盾的事实”^②。瞿秋白揭露了戴季陶“仁慈”主义的实质，认为他“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③。

在各种论争和批判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的观点，而且还宣传和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阐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针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提出的中国先“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尔后通过“协社”逐步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④ 在“万国竞争”的中国，企图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竞存于世界，“不免是空想”，“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⑤ 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⑥。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

在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陈独秀撰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⑦，决不能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反对一切强权。他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个人的“绝对的自由”的论调，指出“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⑧。李达批判了无

① 《恽代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6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4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65页。

⑥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页。

⑦ 同上书，第96页。

⑧ 同上书，第139页。

政府主义所谓“一切国家都是祸害”和“绝对自由”的谬论，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指出，在人类社会，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平均”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还追根溯源，清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

针对国家主义派否定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全民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共产党人不是不要国家，而是“正要建设民主的国家，更进而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①。“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②他们进一步指出，国家主义者总是用国家观念压倒阶级观念，其实质是为了“欺骗无产阶级”，反对阶级斗争，维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实现的。

三 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

随着大革命的兴起，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日趋激化。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要求共产党人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在及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

（一）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方面，1923年，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0页。

② 《恽代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为国民革命(亦可称为民族革命)的问题”^①。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认为,欧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②。瞿秋白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③。

显然,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在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方面的区别,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方面,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④。如果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它便很快会与敌人妥协。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办法是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⑤。毛泽东则更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⑥。

(二) 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中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革命高涨时却妥协退却了,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正确认识这个阶级提供了客观条件。

① 《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页。

④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⑤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对这个问题，陈独秀曾指出：“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①，从而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并初步分析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②。毛泽东的这种分析，符合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奠定了党进一步认识并正确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理论基础。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2月，邓中夏明确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无产阶级要取得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加强对农民斗争的领导。李大钊在考察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后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③ 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④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科学分析了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奠定了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基础。

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这表明党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6页。